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

——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谈⑥

■王任飞

长城瞭望 中国新闻名专栏

纪律是干事创业的“通行证”，而非“绊脚石”；规矩是改革创新的“防护栏”，而非“阻拦索”。

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鲜明提出，“综合发挥纪律教育约束、保障激励作用”“坚持严肃纪律和关心爱护相统一，推动党员、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”。这一重要论述，把严管与厚爱贯通起来，既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，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切期许。

强军兴军，纪律是命脉；攻坚克难，创业是本色。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，便以铁的纪律与旧式武装区别开来，又以敢打敢拼、敢闯敢试的血性赢得一场又一场胜利。守纪，守的是战斗力生成的根本秩序；创业，创的是制胜未来的崭新格局。二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，而是一体两面的统一。正如习主席所深刻指出的，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，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，也为干净干事、开拓进取提供了行为规范。在纪律的框架内，创新不会偏向、闯劲不会逾矩、担当不会妄为，这正是人民军队历经考验而始终步履坚定的深层逻辑。

现实中，仍有少数同志把二者割裂开来、对立起来。有的视纪律为“束缚”，觉得条条框框多了，手脚便放不开，于是把“怕出事”当作不作为的托词，遇难题绕道走，见矛盾往后退；有的则视规矩为“虚设”，打着“敢闯敢干”的旗号越界行事，看似有魄力，实则埋隐患。这两种倾向，表象相异而病根相通：前者把守纪当作怠政的盾牌，消磨的是强军事业的锐气；后者把创业当作破规的借口，透支的是部队长远发展的根基。两者殊途同归，最终都会贻误备战打仗的大事。

今天，我们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。经过持续正风肃纪反腐，部队政治生态愈发清朗，制度笼子愈发严密，容错纠错机制日益健全，“为担当者担当”的导向愈发鲜明。与此同时，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攻坚期，新域新质战斗力建设、实战化训练转型、军事治理现代化等课题摆在面前，哪一项都需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，哪一项都需要有在规矩之内大胆破局的智慧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纪律与担当同频，正是干事创业的最好保证。

纪律教育的要义，不在于让人战战兢兢，而在于让人心明眼亮。做到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握紧思想的“戒尺”必不可少。学纪知纪，方能明边界；明纪守纪，方能从容行。党员干部和革命军人应自觉把他律转化为自律，把条规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准则，如此，面对复杂局面时才能不犹疑，面对创新探索时才能不忐忑。

纪律不是捆住手脚的绳索，而是防止坠落深渊的护栏。做到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必须注重发挥好纪律规矩的“防护栏”作用。在护栏之内，尽可以放开手脚、锐意探索。当前，部队练兵备战、改革攻坚中出现的很多新情况新问题，没有现成答案可抄，要求党员干部和广大官兵必须在吃透规矩精神的前提下敢于试、敢于闯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真正的担当，恰恰体现在对纪律的深刻理解与自觉运用之中。

做到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应把“为公”与“守规”统一起来。干事创业的出发点，须臾不能偏离战斗力标准。凡为公、为战、为打赢而探索的，组织当用好容错机制；凡为私、为名、为好看而妄为的，纵使表面光鲜，也逃不过纪律的审视。实践证明，心底无私，则规矩不再是负担；一心为战，则创新自然有方向。

严管是厚爱，信任是最好的激励。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各级党组织既要在纪律教育上常抓不懈，让规矩意识真正入脑入心，也要在执纪问责上精准有度，准确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区分为公失误与为私妄为，保护那些在遵规前提下敢啃硬骨头的干部，更要在日常管理中传递温度，多一些谈心交心，少一些求全责备，让干部在严格约束中感受到组织的托底与信任。

把每一个平常日子都当作战备日

■刘维姣

画里有话



作者：曾宇明

近日，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、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彬在分享工作经验时，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：“手机24小时开机，排除网络故障绝不拖延。对军人来说，平时就是战时。”话语朴素，却道出革命军人应有的状态：全时待战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融入血脉的职业本能。战场没有作息表，敌人不会挑时辰，军人唯有把每一个平常日子都当作战备日，方能不负使命、不负重托。

历史的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刺骨。甲午黄海海战之前，北洋水师成军之初号称亚洲第一，然而承平日久，备而不战，舰船保养废弛，将士视训练为具文，最终全军覆没。再往前看，北宋兵力百万，却因长期以“更戍法”轮转，兵不知战，边备空虚，致使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。两段历史，相隔数百年，指向同一个铁律：不保持全时待战，是要吃大亏的。

现代战争早已把“突然性”推到了极致。从侦察预警到火力打击，从电磁压制到网络攻防，留给防御一方的反应窗口以秒计、以毫秒计。永葆“平时就是战时”的备战状态，是被战争形态倒逼出的生存法则。当“发现即摧毁、首战即决战”成为常态，任何“临战突击”的侥幸心理，都是对胜利的透支。

思想上绷紧弦，是永葆备战状态的第一道关口。战备之弦，松一寸便溃千里。内务条令将“日常战备”调整为“常态战备”，一词之变，意味深长。它提醒我们，战备不是某个时段的任务，而是军旅生涯的底色。平日里多一分“今夜就战”的清醒，战时便少一分措手不及的慌乱。

做好应急应战预案，是备战的基础。预案不是锁在柜子里的文件，而是随时能唤醒的战斗指令。从战备等级转换到物资模块化装载，从人员定位到特情处置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推演和打磨。王文彬的手机常开，本质上就是一份智力支持的预案——确保任何时刻、任何故障，都有人应答、有手去修。

锤炼过硬本领，是备战的落脚点。没有本领支撑的状态，只是虚张声势。工程师盯着屏幕排除故障，雷达操纵员在机动转移中捕获目标，导弹操作号手独立完成全流程——随时能打胜仗的底气，在于全时练就过硬本领。有了过硬的打赢本领，备战状态才不是空转。

“平时就是战时”，说到底是一种时间观的改变。它把军人从日历和钟表里解放出来，让每一天都具备同等的分量。山河无恙时，我们枕戈待旦；风雨欲来时，我们已在阵位。这便是一名军人对和平最诚实的守护。

长夜终有尽，长征路犹长

■辛士红

玉渊潭

世间终有一束光，照亮一个时代的夜空。

红军长征作为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，不但照亮了那个时代，而且跨越了时空，跨越了民族，至今仍然迸发出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一部微纪录片《长征二十夜》，以“夜”为时空锚点，聚焦长征途中20个特定历史夜晚的决策博弈、浴血鏖战、绝境坚守、生死抉择等，以微光照星河，以瞬间见永恒，反映了红军将士在极端困境下所彰显的理想信念、大智大勇。

一个“夜”字，意味深长。它既是物理时间，更是精神隐喻。夜是黑暗静谧的，也是孕育光明的；是沉静思索的，更是充满变局的。

长征途中，有许多重要会议、重要战斗、重要行军是在夜晚发生的。血染湘江的夜、走向转折的夜、突破天险的夜、力挽危局的夜、破浪出征的夜、智取险关的夜、果敢突围的夜、共迎曙光的夜……这些夜晚故事，场景相似却各不相同。有命悬一线的惊险突围，也有一唱三叹的依依惜别；有势如破竹的强渡抢攻，也有田间小径的提灯独行；有慷慨激昂的辩论，也有深夜守望的牵挂。

“路迢迢，秋风凉。敌重重，军情忙。红军夜渡于都河……”1934年10月17日晚，中央红军8.6万余人在于都河畔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。

当年，于都河上没有一座固定桥梁。于都人民汇集起800余条大小船只，自发捐出家中门板、床板甚至寿材搭建浮桥。为避开敌机侦察、轰炸，掩护红军秘密渡河，浮桥统一在黄昏后架设，昼拆夜搭。于都河上的5座浮桥先后架、拆达15次。

聂荣臻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，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。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……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。想到这些，我不胜留恋。”

长征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胜利之路，而是一场在无边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远征。

长征路上的“两盏马灯”，照见共产党人对真理的执着追寻。

一盏在黎平会议。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，讨论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。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，马灯熄了又亮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。

一盏在苟坝会议。会上多数与会者赞成攻打打鼓新场，唯独毛泽东反对。深夜，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到周恩来住处详陈利害。次日早晨，再次举行会议，决定取消原定攻打计划。后来获取的情报证实，这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场全军覆没的危险。

“征途迷雾锁征帆，会议争明破险关。”直到遵义会议召开，红军官兵“好像拨开重雾，看见了阳光，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光。”

夜渡、夜战、夜行军，红军将士一次次在夜中抉择，在夜色中前进，在夜中战斗。

同是夜行军，在雨雪中和月光下、在山林里和草地上、在前出时和佯动时、在有敌情时和无敌情时，对官兵的要求不同，带来的感受也不尽相同。

李富春同志在《夜行军》中写道：“点火把行军，是很壮丽的”，穿过森林时，“时出时没，如火蛇钻洞，红光照天”；过山时，山顶上“宛如一道长龙，金鳞闪闪”，山脚下则“火光万道，如波浪翻腾……即在钱塘江观潮，泰山上观日，也无此奇迹”。

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则这样写道：“战士们身体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，精神的承受力也达到了极限！不，是超越了极限！他们实在太疲劳、太饥饿、太困倦了，他们的消耗已经太多太多，他们剩下的只有信念和意志！”1935年5月28日凌晨，时任红四团政委的他接到紧急命令后，带领官兵一昼夜冒雨奔袭240里，飞夺泸定桥。

红军将士看起来对“夜”情有独钟，其实，老天爷对敌我双方是公平的。只不过红军将士善于借助夜色的掩护，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从而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，弥补装备上的劣势。

1936年3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5个纵队、近10万之众包围。上万名红军将士借助夜色的掩护，人衔枚、马裹蹄，在敌军的接合部悄然穿梭，成功拖垮并甩掉了追兵，创造了乌蒙山回旋战这一战争奇迹。

灯光下商议、月光下畅谈、篝火旁联欢……当年，红军将士为什么面临苦难不畏难、身处绝境不绝望？因为坚信：夜再长也有尽头，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最接近光明的时刻。

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，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。今天，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，去聆听那些黑夜里的心跳，去感受红军将士对光明的渴望、对胜利的向往、对信念的笃定，就是要赓续红色血脉，掌握铿锵前进的制胜之道，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、书写新的荣光。

长城论坛 中国新闻名专栏

用心用情做好思想政治教育

■白建国

一堂政治课的力量，能穿透多少年的光阴？一名优秀政治教员的作用，到底有多大？

习主席曾深情回忆他初中一年级上政治课的情景：“我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述焦裕禄的事迹时数度哽咽，一度讲不下去了，捂着眼睛抽泣，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肝癌最严重时把藤椅给顶破了，我听了很受震撼。”

对一名军人而言，优秀政治教员就是军旅生涯中那盏不灭的灯：未必最耀眼，却能在灵魂深处照出一条路来，让后来的翻山越岭都有了方向。

近日受表彰的50名全军优秀政治教员，就是这样的“播火者”。他们站在讲台上，也走在队列里；他们讲的是道理，给出的也是自己的信条。官兵或叫他们“兵心捕手”，或称呼他们“灵魂工程师”，叫法不同，说的是同一个道理：一名优秀政治教员，能让教育从纸面上站起来，走到人心里去。

“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。”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，政治教员就是那个把理论的光打进头脑深处的人。再好的道理，如果没有人去“翻译”成官兵听得懂的语言、感受得到的温度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。政治教育之所以不可替代，恰恰因为它是“用一个人的灵魂去唤醒另一群人的灵魂”。政治教员站在那里，本身就是衡量教育是否可信的一把尺子。

这批受表彰的优秀政治教员身上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会知兵、会施教、会谈心、身教好。知兵，是对战士的各种情况知道的细，知道的深；施教，是把大道理掰开揉碎，讲到心坎上；谈心，是让一个年轻人在孤独时有地方可以开口；身教好，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引导影响战士。刘正斌教授从教37年，学员留言里出现最多的词是“毕生难忘、由衷感恩”。他说过一句话：“名师之‘名’，就是在夕阳西下之时，还能有口皆碑。”这大概就是“身教好”最朴素的样子。

今天的官兵以00后、05后为主体，思想活跃、视野开阔，也比任何一代人都能更敏锐地分辨“谁在说真话”。面对这样的兵，表彰这50名优秀政治教员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导向：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地“灌”，而是平视中的“引”；不是把道理当任务交出去，而是把道理当礼物送出去。榜样立在那里，比一百条要求都更有说服力。

知兵，是育兵的第一块基石。一位优秀的指导员能记住全连每个战士的家乡、生日和最近皱过的眉头。他知道谁训练掉队是因为脚伤，谁夜里难以入眠是因为家里来了电话，谁嘴上说“没事”时其实最需要有人坐在旁边。官兵想要一杯水，教员不仅要有一桶水，更要清楚那杯水此刻该是什么温度。教育对准了人，道理才不会落空。

列宁说：“没有‘人的情感’，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。”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口，从来不是概念，而是情感。很多政治教员把理论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，老百姓爱听，因为他们“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”。用心用情做好思想政治教育，说到底就是把官兵当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去爱，而不是当成一批名字去“管理”。情感到了，道理的种子才有土壤发芽。

罗荣桓同志说过：“不要只是以口号去要求别人，那样只会使自己脱离群众，使自己成为一个空头革命家，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。”身教之所以是最后的“一好”，因为它是前面“三会”的底。讲自己所信的，做自己所讲的——官兵也许记不住一堂课的知识点，但一定记得住那个教员在关键时刻站在哪里。施教者知行合一，受教者才会紧紧跟随。

50名优秀政治教员站在那里，不只是50个榜样，更是50颗火种：他们怎样对待课堂，课堂就怎样对待官兵；他们怎样对待官兵，官兵就怎样对待强军事业。用心用情，从来不是一句柔软的口号，而是一支军队在灵魂深处最坚韧的守护。

e海识风

考卷深处是家国

■李睿恒

考试，从来不只是考知识。一纸试卷里装着什么，便在年轻的心里种下什么。

最近，江苏无锡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考试，把1948年11月4日《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（节选）》搬进考卷。考题中，5个小题，共19分，配一张作战态势图，要求考生对照电文填兵团番号与位置，补写军事短语，并依据第一阶段部署推演后续指令。

这样的考题，考生的感受很直接。有人考完直呼“上头”，自己一边盯地图找番号，一边回头对时间，恍惚间真以为坐在指挥部里；也有人笑称，这题做下来，淮海战役怎么打的，比看历史书还清楚。分数哪怕不高，但那段历史却真切地进了心里。

卷面背后是硝烟。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唯一我军兵力少于敌军的一战，以60万胜80万。命令签发于战役发起前夕，字里行间是彻夜的研判与决断。当年读命令的人，不少没进过几年学堂，却在军情如火中读透了意图。他们把生死放在一边，把人民放在前面，这份情怀比任何修辞都重。

让这样一份命令进入年轻学生的阅读，导向并不隐晦。它不宣讲，不说教，只是让一个个18岁左右的高三学生在考场上，与70多年前那些同样年轻的生命，共享同一套地理坐标。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外加的标签，最高级的文采是执笔定乾坤。当年轻的手指划过“碾庄”“陈官庄”“徐州西南”等这些字眼时，历史已经在无声地完成它最扎实的抵达。

这道考题还藏着另一层用意，即文风也是战斗力。对此，有跟帖写得很透：“没有任何华丽辞藻，行文高度凝练、信息密度极强。”我们倡导“短、实、新”的文风，这份作战命令，恰好让我们看到，言之无物的长文，在文牍里消耗的是时间；言之有物的短令，在战场上赢得的是先机。

对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，这道题的分量远不止19分，它更像一次提醒：战场上的“阅读”，考的是精准预判敌情、合理运用战法的本领。当年的命令之所以可靠，源于对战场的深入了解与冷静研判；今天的战场情况更庞杂、节奏更迅疾，读懂态势、抓住要害的功力，一点也不能少。

1948年春，粟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，斗胆直陈，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第一兵团暂不渡江，集中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，最终被采纳。因此，军人答好这道题，在于是否养成那种冷静、缜密、敢于负责的思维习惯。

考试有名次，战场无亚军。练兵备战中，多读一份真实材料，多练一次冷静推演，多存一分对历史的敬意，战场上就会多一点从容。相信各位战友会以今天的努力，把胜战答卷写在明天的战场上，让那纸军令的回响，一直传到未来。